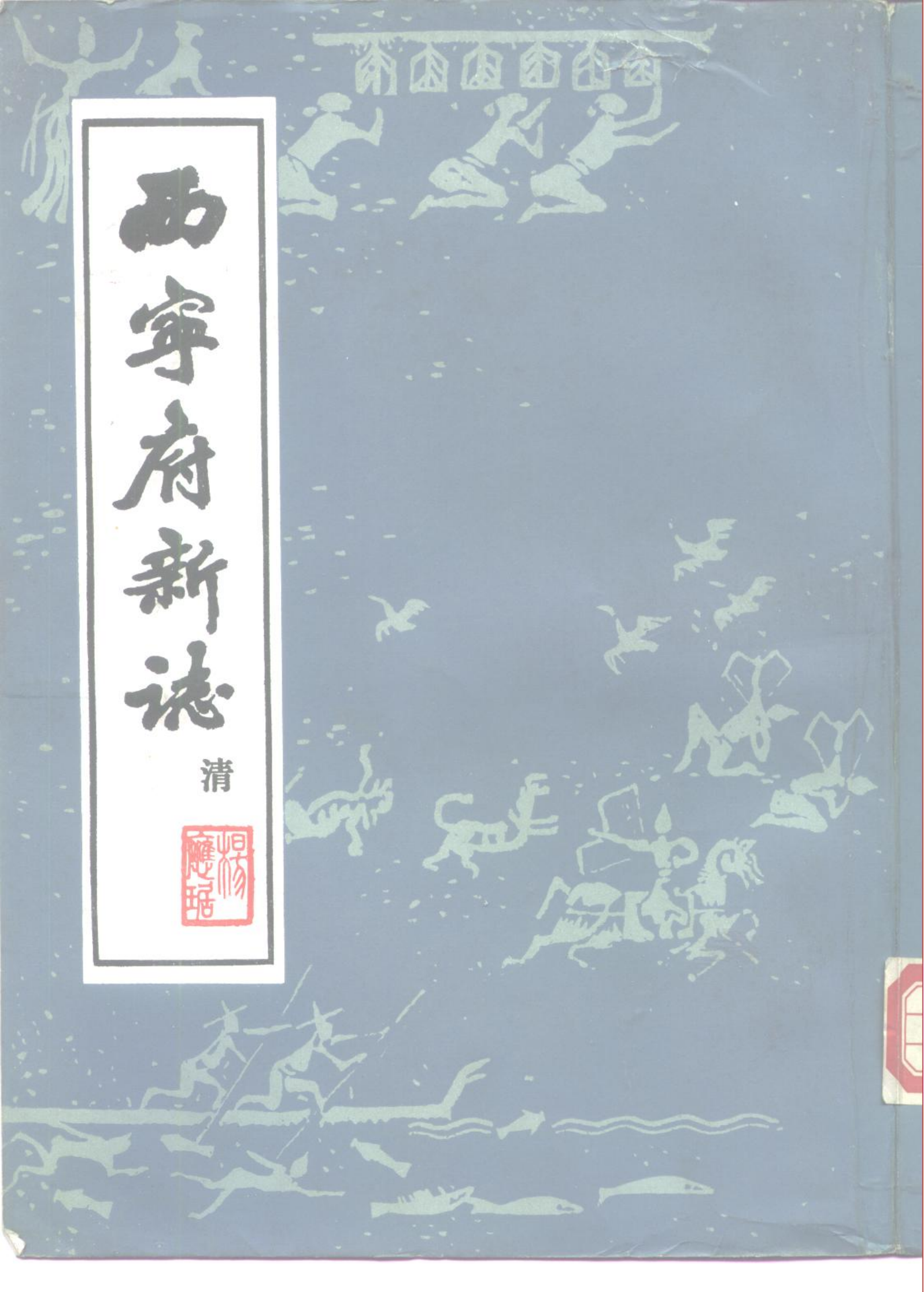


西寧府新誌

清



**西 宁 府 新 志(清)**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65.5 插页:2 字数:48,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225-00187-6/K·19

定 价. 15.00 元

## 重刊西宁府新志弁言

(一)

编写历史专书，首先必须搜集整理资料，因此行政档案和方志记载，便成了撰写任何国家和地方历史专书的主要基础。

就中国历史著述而言，纵的记述有从春秋、左传开始以至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有从史记开始以至明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一般称为二十四史，或加新元史称为二十五史。而清史稿尚不在内）；有从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直至明史记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前人所创立的这三体历史著述，各以不同的体例，或以时间为纲，按年月先后记述史事；或以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记述各个

时期历史事件的发展和演变；或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记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这三体史书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纵的记录，这类纵的记述历史发展的著作的共同点是它以记叙过去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事件发生发展经过为主。而一国、一地历史发展的横切面记述的任务，则由另一种别体史书来承担，与上述三体史书相辅相成，加上别史、职官、政书各类著述，组成中国旧日史书的完整系统。这种对一国、一地历史的横的记述，包括政治、经济、天象、气候、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等的分篇记载，按时纂修，过去叫做方志，就是现在通称的地方志。地方志做为正史和别史的一个横切面，正是它纵横结合，相辅相成的独具体例。在认识纵的历史发展方面，它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在横的历史综览方面，它又起着贯通一国一地古今的作用，而它的主要任务和特点，则以记载地方现状，搜集整理当代文献等资料为职志。这种及时整理保存社会发展资料及自然现象的方法，使地方志具有了比正史、别史更为现实切近的借鉴、取资的作用。因此自方志和方志学兴起与形成后，便成了历代政府和地方官赖以制定切实可行的

1917

施政方针的主要依据；同时对后人来说，它又是据以撰写新的历史著作的文献宝库。地方志的这个特定作用，在当代事事都要根据实况来进行科学规划的要求下，更显得特别突出。我深深感到中国地方志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它既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和新的生命力，我们之所以重视它，是要它来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同时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扬弃旧方志的一些封建观点和糟粕，使我们当前在这方面的努力，成为编修新方志，建立新方志学的一个新起点。

(二)

说起中国的方志和方志学来，它也是随着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而逐步伴生、发展、形成起来的。它的渊源来自上古，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借用一句古话来说是由「附庸而蔚为大国」的。

「方志」这个名称，可能来源于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这

句话。可见古代就有专记地方历史、风物、人情等一类的史官的。相传孔子修春秋，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地方史，而当时把它称为「宝书」，可见地方史材料对当时政治的重要性。这个「宝书」传统，以后继续得到发扬，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曾命令南阳地方撰写了南阳风俗传，隋书·经籍志说这是「郡国之书」的滥觞，所以「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庐江有名德先贤之传」。大概周官所说的「宝书」，早就失传，所以隋、唐时便以记载一时一地人物、风俗等的著述为地方史的滥觞。

实际上在魏晋以前，尚不具备今日这样的地方志概念，所以有些是地方大事记，如吴越春秋、越绝书；有些是古地理专书，如禹贡、职方；有些是地方人物或风土人情的记述，如三辅耆旧、庐江先贤及南阳风俗传。但这类著述，却构成后来方志的主要部份。古代的山海经是有图的，而据华阳国志所引，则东汉时的巴郡图经既有舆图，又有文字记载。所以从这以后，方志的体制，便逐步开始形成。晋代挚虞作畿服经，今虽

不传，但据记载，已具备分野、封略、国邑、水泉、乡亭、土田、民物、风俗、先贤等分目，不仅保有方志的地方性，而且粗具了后世方志的体例。东晋时常璩作华阳国志，记述巴蜀地区的地理、史迹、风俗、人物，且有序志、赞论、三州士女目录，是传留到现在的一部最早的地方志。自此以后，方志便以记地、记人的体例继续发展，出现了晋裴秀的冀州记、北魏王遵业的三晋记、刘宋盛弘之的荆州记、刘宋孔灵符的会稽记及有关青海古史的刘宋段国的沙州记（州治在今贵南县地区）。这些具有地方性的著述，有的记地理，有的记风俗，有的记人物，有的叙事迹，都分别纂述，不及华阳国志详实赅备，但仍是方志旧传统的继承，到隋唐时国家大一统局面形成后，方志的著述便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

隋炀帝时通令全国各郡县「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根据各郡县上报资料，编成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又命虞世基编成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由郎蔚之编成诸州图经集一百卷。为后世由政府修纂总志，由地方分纂省、州、县志的先

声。

唐代是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兴盛的时期。太宗时在他的第四子李泰领导下编成了一部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这不仅是一部「内殫九服，外极八荒」、反映唐代鼎盛时期的广阔疆域和唐帝国高昂的精神面貌的方志杰作，而且在编写和文字上也「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唐太宗李世民诏语）。是政府所修总志中规模最大，考订精审的巨著，可说是方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可惜现在仅留下不及原书百分之一的辑佚本。

唐德宗李适时，又规定各州郡每三年或五年要向中央政府造送一部图经，成为定例。宪宗李纯时由宰相李吉甫负责编成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对当时全国各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户口、贡赋、物产等，均有详细记载，是方志体例最为完善的代表著述。原来十七镇都附有地图，从南宋时起，所有图均归散佚，也很可惜！

唐代个人有关方志的著述，如贾耽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梁载言



的十道四蕃志；陆广微的吴地记；林谿的闽中记；孟瑁的岭南异物志等，也都是方志传统的继续发扬。

(三)

我们若把中国方志发展形成的历史，粗略地加以概括的话，则大致可以看出：先秦为萌芽孕育阶段；汉魏晋隋唐为形成阶段；而宋元明清则为大发展阶段，就是上面所说的附庸蔚为大国的发皇时期。在前两阶段中，方志或由分而合，或由合而分，或分合并行，终于产生了由政府主编的总志，并列入规划，见诸功令，方志的重要性，已和官修正史一样地突出了。

宋代尚未及完全收拾好五代十国分割动乱的局面，就上承唐代官修地志的成例，从事地方志资料的搜集与编纂。宋史·职官志说：

「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  
仍是三年一进，按时編集。这种定时造图的制度，突出了方志以记载现状为主的特点。

唐宋以来定期修志的办法与制度，是方志逐步脱离正史而独立存在的主要条件。宋朝初年，亟待了解和掌握刚被收复平定的各州郡县疆域、道里、山川、阨塞、风俗、物产等的情况，以便加强中央统一政权，因而就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开始重修天下图经，经过了四年，便修成了开宝诸道图经，尽得江表十九州形势。不难看见封建王朝修志的主要意图，是在掌握山川形势，了解地方情况，而为加强统一局面服务的。到宋真宗时继之纂修祥符州县图经，卷帙多达一千五百六十六卷，成为唐括地志以后的又一巨著，但经南宋播迁，它也和括地志一样地散佚殆尽了。宋代有关方志，今存的有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中由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和神宗赵顼时由王存编定的元丰九域志，于地理之外，别立姓氏、人物、风俗诸目，而且还兼收艺文、诗词，于是方志的体例便开始被底定了。此外，有关郡县的分志，有赵不悔、罗愿的新安志；史安之、高似孙的剡录（今浙江嵊县，在汉为剡县）和范成大的吴郡志，都体例完整，引据典核，叙次简洁，为后世州县志所仿效。

元、明、清三朝，为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时期，形成了空前广大的版图，掀起了鼎盛的文化高潮。与此相应，方志与方志学也更形发达。元世祖忽必烈的版图，掀起了鼎盛的文化高潮。与此相应，方志与方志学也更形发达。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时，集贤大学士札马里鼎提出：『方今尺土一民，尽入书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于是反映一统江山形胜、物产丰富、人物殷盛的大一统志便出现了，成宗铁木耳大德时的大元一统志，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完成的。其书网罗赅备，通贯古今，蔚成巨观，继此的明一统志及清代三修大清一统志，都是大一统精神面貌的继续发扬。与全国一统舆图相表里，从元代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为此后的省志树立标帜起，明、清两代的省志便蓬勃建立发展，其中如明修山西通志、陕西通志，均经三修；清代续修陕西通志，也先后经过两次，并颁令全国以为法式。清康熙二十二年通令全国各省限期完成省志的编纂，各省通志，粲然大备。而自明以还，有许多学者参与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出了不少名著，如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王鏊的姑苏志、陈士元、侯绍歧的涿（州）志；清代则如陆陇其的灵寿县志、钱大昕的鄞县志、王鸣盛

的嘉定县志、朱彝尊的新安志、洪亮吉的怀庆府志、章学诚的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等。虽然后世的评价不一，但明清方志著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全面繁荣起来，则是方志史上光辉的一面。所谓全面繁荣，是指除了总志、省、州县志以外，还有军事方面的专志，如明代郑晓的九边图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等；有关名胜古迹或乡里的小志，如黄山志、杏花村志（安徽池州）、甘棠小志（江苏甘泉邵伯镇）等。这样完整的体系，也是到本阶段才建立起来的，于是地方志便成为一方的全史，由舆地学而成为方志学，与历代国家颁布的正史相辅而行，特别是成为保存文献资料，记述自然、社会两方面现状的最佳体裁了。

这阶段中方志著述的进一步成熟和高度繁荣，是与方志学理论的陆续建立密切相关。早在唐代，徐坚就曾提出方志应如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力求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对纂修方志，提出了与修史一样必须直书的原则。虽然宋元以来的方志作者，并未能完全做到这点，但它却为方志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史家精神

道德的軌范。清初顾炎武和顾祖禹先后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读史方輿纪要，又把经世致用的目的和精神贯穿到方志学中；到了乾隆时的章学诚，便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总结出「方志乃一方全史」的定义，确定了方志的定义。他说：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地方志就是地方史，就是由他确立的，这无疑是方志学的一块奠基石。「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对方志的性质和作用，一并有了切实的阐述。接着他又提出了「三书」议和「四体」说，所谓三书，指的是必须要建立的体例结构。他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方志必立「志」、「掌故」和「文征」，既是史家的传统，又是修志的法度，要求

必须做到体例精严，结构明晰。这是他对自古以来方志体制的进一步总结，因此他还针对三书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指明了「掌故」和「文征」是文献资料的编辑，是所谓「纂类之书」，而「志」则是著述之体，没有原始资料编辑，著述便无由取资，二者缺一不可，而又不可混为一体，因为两者的比类不同，作用也就各异了。他所谓的「四体」，是按地方史的性质分列四个门类，即：「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盖「皇恩庆典」仿自正史本纪，「年谱」仿自百官公卿年表，「考」仿自书、志，「传」仿自列传，均师正史之意而略变易其名称。在封建制度的局限下，他认为这样「变易名色，既无僭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遗漏之患。」四体分明，再加上「其他率以类附」的附录，方志的结构便完全建立起来了。

确定方志是一方的全史，使方志脱离地理而独立；「志为史裁」，因此除了建立完整的体例外，还必须用写史的方法来写志，恪守史家法度，做到文直事核，所以他还反

对文人修志，既忌详略失体，又忌偏尚文辞，这些都对后来的修志工作起了重大的影响。他的有些主张，限于时代条件，并没有在后世得到实行，但在旧时代方志的进一步发展和方志学的建立上，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清代杨应琚的西宁府新志，就是在清初这个方志与方志学趋于鼎盛的高潮前后产生的。这部方志的受人重视，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方志学与方志的修纂，在五四以后又进入一个新时期，体例与要求，也因时势的变易、科学的昌明和条件的完备而有所不同。自从抗日战争期间黎劭西（锦熙）先生发表方志今议，不久便有由黎先生自己主编的城固县志，由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北碚志先后编成。踵武前烈，开示方来，对解放以来新方志的修纂，具有直接的影响。目前对新方志的要求，特别强调其科学性与现代性，而在体例上，尤重视社会各类状况的统计数据和地方大事年表及有关图表，而在理论上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点为依据。一个新的地方史志发展高潮，正在全国蓬勃形成。

(四)

上面我不惜辞费地侈谈上下两千年、纵横九万里的方志发展概貌，其意图，是想把西宁府新志这部在本地区有开创性的方志著述，摆在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时代中来加以剖析与介绍，如此则这部方志的特点和代表性，便会较为清楚而具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我们既有所师法，又有所批判，不致人云亦云，或莫衷一是。

今青海省所在地区，三代为西戎地，属雍州；秦汉间为西羌地，属凉州。汉武帝逐诸羌，筑令居塞，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羌，开湟中，驻军屯田，置破羌县，属金城郡。东汉末由金城分置西平郡，治西都县。从西汉到东汉末年，汉所管辖和设治的范围，只在三河（黄河、湟水、浩门水）地带，约相当于今天的东部农业区十县市所在。直到清初，才正式在西宁设立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管辖日月山以西广大牧区，设置驿站，直通西藏，归中央政府理藩院领导。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改明所置西宁卫为西宁府，辖西宁、碾伯二县，一大通卫，乾隆初又将原隶甘肃临洮府的归



德所划归西宁府管辖。

从西汉初建西平亭到清初置西宁府，时间长达两千年。这块地方，由于地处偏远，文化落后，一直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志可资查看。至今留传下来的有关本地区记载，仅有南朝刘宋时段国的沙州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刘元鼎吐蕃黄录、宋李远、汪藻等的青唐录及清初佚名的秦边纪略等寥寥数种。而相传明嘉靖间邑人张莱所草创的西宁卫志（见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七献征志·人物），万历间西宁兵备道刘敏宽、同知龙膺所修西宁卫志（见西宁府新志卷三十一纲领志）和清顺治间苏铤所修西宁志（见清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旧志，到乾隆初杨应琚修新志时，有的早已散失，应有的也仅存残卷。疆土开拓，文献无征，这是与当时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形势和要求不相的。早在康熙时已通令全国普修省志，雍正时复诏各省纂修通志，旋又颁布各省、府、州、县志每六十年一修的命令，为大清一统志的修纂鸣锣开道。而康、雍、乾三朝又是文治武功、经济文化的又一高涨时期，修志成风，名家辈出。在这种时代风气和政